

中外传播教育比较研究丛书
丛书总主编 刘海贵

中美传播学 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

伍静 著

A Review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China & USA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重大项目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外传播教育比较研究丛书
丛书总主编 刘海贵

中美传播学 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

伍静 著

**A Review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China & USA**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 / 伍静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209-05525-3

I. ①中… II. ①伍… III. ①传播学: 比较教育学—
中国、美国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644 号

责任编辑: 王晓晖
封面设计: 蔡立国

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

伍 静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2mm×232mm)

印 张 13

字 数 170 千字 插 页 1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525-3

定 价 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序

刘海贵

美国的传播学教育始于上世纪初,属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其发展总体上是健康、有序的,至今仍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英国、日本、韩国的传播学教育属后起之秀,在特色上自成一格。中国的传播学教育起步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势头虽然迅猛,但所走过的历程却是坎坷震荡。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方成功的办学经验,进一步改进并推动我国传播学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2004年启动了重大项目“中外传播教育比较研究”,设中美比较、中英比较、中日韩比较三个子项目。



历经数年的辛劳,如今《中外传播教育比较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了。可喜可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8年修订的研究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中,首次把新闻传播学定为文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一定位意义重大,充分说明了我国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特色及初步成果被肯定,传播学在我国被正式承认。

传播学在中国虽然已经落地,传播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总体状况也属健康,但是,相比较西方的传播学教育,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应尽快着手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教学规模无序扩张。近三十年来,传播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奇快,教学规模几乎成几何级数扩张,今天谁也说不清楚我国高校设传播学教学点的是五百家还是八百家,在校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数是三万人还是五万人。在中国的多数高校,新闻学几乎占据“君王”宝座,传播学也日渐成为咄咄逼人的“新贵”,师生比例严重失调。

在西方,传播学、新闻学的教育主张“控制规模、精心培养”,招生数及其教学规模是适量控制的。在学科排列位置上,一般也落在文、史、哲、经、法学等之后,同我国的现状呈明显反差。

二是课程设置杂乱无章。西方的传播院系“传字头”、“新字头”课程一般控制在所有课程的三分之一以内,其余在加强通识教育和素质培养的理念下所设课程皆为文、史、哲、经、法等。我国的传播院系虽然口头上也在叫通识教育、素质培养之类,但“传字头”、“新字头”课程一般至少都在二分之一以上,加之外语、体育和思想品德类的一些课程以外,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选择的空间就极小。

三是师资配置合理性弱。综观中国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师资,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院系自身,从媒体和相关公司引进的业界人士极少,从

业界聘请的专家也不多。这样的师资要培养出综合素质好、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是不现实的。没有在河里、海里扑腾过的人,要想培养调教出真正会游泳的学生,离误人子弟亦已不远。

美国新闻传播院系的师资配置较为合理,业界人士占三分之二左右,“学院派”教师为三分之一,大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取长补短,理论教学与传播实际最大程度地联系在一起,学生确实能学到真本领。

四是教学方法单一呆板。西方的新闻传播教育特别讲究教学互动性,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教师一开始作一启发性的阐述,然后就组织学生讨论、提问,或是进行模拟实践。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动脑筋,全身心投入。教师始终参与其中,最后略作点评。这样的教学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在十分热烈的课堂气氛中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成效显著。

反观我国的新闻传播教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教师尚停留在“一言堂”、“满堂灌”的状态,学生几乎没有发言和参与的机会,不打瞌睡、不逃课才怪。新闻传播学是应用学科,培养的学生如果都是“高分低能”和动口不动手的“君子”,显然是教学方法上出了问题。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传播教育比较研究》丛书的问世,无疑有助于给从事传播学教育事业的人们以启发和借鉴。廖圣清、崔清活、伍静三位丛书作者,均属我国高校从事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年轻有为的骨干教师。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他们分别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分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进行调研和学习。相信每位读者在阅读了这些丛书后,能感受到书中呈现的资料是丰富的,数据是权威的,观念是新颖的,通过比较后推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是为序。

2010年4月于复旦

(刘海贵: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CONTENTS

序 / 1

第一章 绪 论 / 1

第一节 问题意识 / 1

第二节 关键概念 / 6

一、学科 / 6

二、学科制度 / 7

三、建制史 / 9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11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 11

二、国内的研究状况 / 17

第二章 传播学在美国的早期建制化历程 / 22

第一节 新闻学院的“准备”：新闻研究的局限性及其 “社会科学化”的拓展 / 22

一、1870年代~1920年代末：职业取向的新闻学研究兴起 / 24





二、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研究对新闻学领域的侵蚀 / 31

三、1940年代中期~1960年代:新闻学研究向大众传播学研究全面转型 / 38

第二节 作为行为科学的传播研究的酝酿和兴起:私人基金会、管理型学者与社会政治思潮的历史交汇 / 39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拉扎斯菲尔德、教育广播与新型研究建制的开创 / 40

二、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马歇尔、拉斯韦尔、二战与传播研究主导范式的形成 / 49

三、福特基金会、贝雷尔森与作为行为科学的传播研究的兴起 / 56

第三节 施拉姆式传播学在新闻学院的建制化 / 63

一、因缘际会:新闻院系并非是传播学生长的天然沃土 / 64

二、爱国斗士: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在二战和冷战中的形成 / 68

三、跻身名门:四大奠基人、信息论与学科合法性的建构 / 74

四、顺水推舟:从布莱耶的新闻教育到施拉姆的传播学教育 / 80

第四节 被掩盖的诸种建制可能性 / 87

一、芝加哥大学短暂的传播学建制 / 88

二、社会学为何“抛弃”了传播研究 / 91

三、舆论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同路与歧路 / 94

第三章 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建制化历程 / 96

第一节 内在知识的演化:传统新闻学的理论拓展及其与传播学知识的衔接 / 96

- 一、从“工具”到“媒介”/96
 - 新闻学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3),传播学话语对极左政治宣传的冲击/96
- 二、从“消息”到“信息”/105
 - 新闻学恢复确立时期(1983~1986)对新闻本质的探寻及其与传播学话语的勾连/105
- 三、从“传统新闻学”到“中国式新闻传播学”/115
 - 新闻学丰富发展时期(1986~1989)对大众传播学的洋为中用/115

第二节 外在制度的设计:美国传播学建制化模式与主导范式在我国的移植/121

- 一、新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与传播学的擦肩而过:社会科学在院系调整后的整体停滞/121
- 二、传播学进入“外国新闻事业”的视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流派”/124
- 三、传播学独立“学科”意识的萌发:对美国学科建制模式的模仿/131
- 四、“施拉姆学派”的引入:学科建构的霸权过程/136
- 五、“传播学即宣传学”:社会对传播学的接受与阐释/147

第三节 传播学初步实现建制化: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例/152

- 一、早期传播学选修课的开设/153
- 二、传播学硕士生的招收与研究队伍的初步养成/158
- 三、国际交流的兴起与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机构的成立/160

第四章 对照与反思/162

- 第一节 中美传播学建制化的不同路径/162
- 第二节 对建制化的反思/169

参考文献/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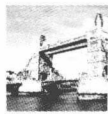
后记/19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

关于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新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国内的传播学界,一直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热点话题(詹正茂,2004)。在与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界交流时,中国学者提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往往是如何看待大学里新闻学与传播学之



争的现象。^① 这的确是同行间相互攀谈时最方便的话题,因问话中暗藏着一个不经意的前提,即中美两国的大学共有一些大体相似的学科建制,尤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个根本性的共同点是,两国的传播学都是在既有的新闻教育的建制内生长起来的。

殊不知,“新闻学”也好、“传播学”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字面的表述、一种简化的符号和标签,背后纷杂的含义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明。^② 不过,考虑到中美两国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确有一些彼此相通的规律和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分别用中国语言中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去对应美国的“journalism”和“mass communication”本无可厚非。但若上升到学术探讨的层面,则不得不考虑每个符号所连带的一整套语境。

不同国度的同一学科,由于来龙不一,去脉各异,内涵也就差别甚大(桑兵,2005:5)。因此,脱离渊源脉络的所谓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是一个伪问题,是“茶壶里的风暴”^③。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曾称“新闻(journalism)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转引自潘忠党,2005:120)。凯瑞在此处所用的“journalism”一词与中国语境下“新闻学”的内涵与外延并非完全重合。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当前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作泛泛之论,仅拿中美两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作简单的类比,而不是回到历史中去追寻两国各自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从接触到融合的演变轨迹,笔者怀疑这有关的讨

^① 譬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等主编的《传媒镜鉴:国外权威解读新闻传播教育》一书中的诸多访谈即是围绕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展开(钟新、周树华,2006)。通常,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同行那里得到的回答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不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有什么冲突,两者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另一种是从学与术的角度阐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学与术的矛盾岂是新闻传播学领域所独有?

^② 譬如,把“journalism”简单地翻译成“新闻学”就很值得商榷,journalism在美国明显还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

^③ 李金铨语。引自李金铨教授2005年8月16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承办的2005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课余与学生的交流。



论会不会永远是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

宏观地来看,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都属于舶来品,起初都是从美国引入),不仅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在中国^①大行其道,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其新闻——传播的学科制度也在中国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制和搬用。对于前者,即知识层面,我们历来不乏关注(尽管有些僵化和滞后),而对于后者,即制度层面,我们尚不能说有敏锐的感知。也许是因为在既有的制度中浸润日久,我们早已习焉不察地接受了某些外在的制度设计,而绝少有人意识到这貌似客观化的安排也许未必是历史发展的常态。

笔者过去一直为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进入本科高年级时开始接触到传播学的课程,那时只听说传播学比新闻学专业更时髦、更前沿、更有理论,传播学专业的人就业面更宽、更有发展前途,别说是当记者了,就是广告、公关也样样来得。但真正进入课堂,总隐隐地觉得施拉姆、拉斯韦尔之流似乎和我们未来的记者行当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然而,直觉归直觉,课照上,试照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毕业了。以至于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生对传播学往往是“常识丰富,趣味欠佳”。相信很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和笔者一样,压根儿没有深入地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在大学里“必修”传播学的课程,为什么在我们的专业里其他学科的课程(比如社会学)没有和传播学一样享有与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地位。可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都是这样按部就班地走过来了吗?

照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无所不包,借“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自己的话说,“在美国,传播研究关注信息和思想借以交流和共享的一切方式。因此我们讨论的既有大众传播又有人际传播。我们讨论语词、信号、手势、姿态、图画、视觉表现、印刷物、广播电视、电影——人类试图相互传

^① 本书中如不特别说明,“中国”一般指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学建制史与大陆不尽相同。

达意义和价值所凭借的一切象征和符号”(Schramm, 1963a:6), “任何研究社群(community)的人,都必须关注一下传播”(Schramm, 1980:73)。如果说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如此广泛,试问还有什么不是传播呢?如果说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等无不是传播,那为何在应用性课程上,传播学独独钟情于新闻、广告、公关之类,而不是文学创作、音乐表现、建筑设计等等呢?传播学为何从新闻院系开始?为何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处在“同一屋檐下”?两者的联系起初是如何建构和产生的呢?对于这一连串本质上属于学科制度范畴的问题,扪心自问,我们作出过透彻的回答吗?久处新闻—传播学科制度中的我们这代人,还能不带成见地想象制度变换之前的状态吗?是否正如台湾历史学者刘龙心(刘龙心,2000:275)所指出的,“学科体制给我们的影响太深,深到我们视这一切为理所当然,也深到我们甚至已经无从察觉到它的存在。……正因为我们从不去追问这门学科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们对这门知识发生的过程以及演进的历史皆莫名所以,在‘内忧外患’来袭的时候,当然只好弃械投降”。

从产生过程来说,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是二战后跨学科研究时代出现的一门派生学科(derivative discipline)。在与其他学科的“贸易”中,传播学始终处于“入超”地位。作为跨学科的产物,传播学与新闻学很难说有什么“嫡亲”的关系。“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在各种因缘际会之下,“将他的传播学观结合到新闻学院之中,因此就在重要的方面构成了传播学领域后来将要成为的样式”(罗杰斯,2002:18)。所谓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最初即导源于施拉姆的这一锤之定音。换言之,新闻学与传播学并置,并不是因为学科知识起点一致,也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一半是出自有心人的刻意捏合。这正应了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米尔斯,2001:150)的一句话,“每个社会科学各个分支都是由某个学术类型的内在发展形塑的;同时也受到制度‘偶然因素’的决定性影



响”。但是,新闻—传播相联结的建制化模式一旦确立,即对新兴传播学和既有新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实力日升,影响日大,以至于成为学术霸主和中心,其学科制度亦成为后发国家——中国——照葫芦画瓢的样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引入传播学的实践,可以说是美国式的新闻—传播学科制度在转型期中国的翻版和嬗变。^①

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创立或引进,绝非自然形成,势必要历经一番擘画、构思和建制化。如上文所提到的,出于惯性和习以为常,很少有人认真地思索和研究过这一过程。而这正是笔者想在本书中试图触及的问题,简要概括即是:在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社会环境和高等教育组织文化中,有哪些内在的必然因素和外在的偶然机遇,致使传播学在既有的新闻教育体制中萌芽、生长以致建制化?对照传播学的原产地——美国的相应情况,中国传播学早期建制化的历程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一门学科若连自身形成的历史都不了解,如何有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传播学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是从什么地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并把握好未来的方向。从学科制度的中观视角来审视传播学的建制史及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之渊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眼界。笔者倒认为这是一个待开垦的生荒地。这种阐释角度将有希望使一些被忽略和掩盖的史实被重新发掘与激活,揭示出被压抑和遮蔽的各种可能性。笔者亦希望借助本书尝试保留、整理出一点具有历史视野和参考价值的资料,供以后的学者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并在新的起点上探讨我们学科所面临的问题,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与途径。

^① 中国引入的所谓“传播学”,实际上乃是大众传播学一枝独秀,尽管“大众”二字常被有意无意地省略。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没有一家传播院系能涵盖广义传播学的所有领域。



第二节 关键概念

一、学科(discipline)

学科(discipline),作为典型的西方语汇,是清末实行学堂分科教育以后才逐渐由西方引进的一种知识分类概念。“discipline”在英语中既可作为名词,又可作为动词使用。在定义上,“discipline”具有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约束以致熏陶等多重含义(转引自刘龙心,2000:2)。也即是说,这个概念实质上是将知识分类与规训制度的双关意义集于一身。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制度完全取自西方,因而在汉语里原本没有与“discipline”恰好对应的词语,“学科”一词是对西文的翻译。

“学科”(discipline)一词的转译,集中显现了中西思想交流中知识的挪移和错位。一旦被置于中国的语境中,“学科”概念原本兼具的制度面含义随即遭到遮蔽,单从字面上已经很难读出其隐含的制度、规训之意。现如今,“学科”成了一个被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用俗用滥”的词汇,例如“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学科教学”、“重点学科”等等,大多内涵空泛,指向不明,行政味浓。“学科”概念在日常杂碎中渐失其批判锋芒和怀疑精神。

在中国语境中,什么叫学科?孔寒冰所下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角度看,学科的含义指的是“教学的科目”(subject of instruction);从生产知识、学问研究的角度看,学科的含义则是指“学问的分支”(branches of knowledge);从大学教学与研究组织的角度看,学科又可作为学界的或学术的组织单位(unit of institution),即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孔寒冰,2001)。诚然,为了叙述的方便,作这样条分缕析的概括未尝不可。只是如此一来,教学、研究以及它们所依托的物质机构就



成了钉是钉卯是卯、截然三分的东西,而三者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被肢解掉了。一些单纯以教育史或研究史为取向的研究,纵使其考察对象有重叠之处,例如势必都要谈到课程、教材、师资、机构等,但却是以把教学与研究视为迥然不同的两个范畴为前提的,硬性打破了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内在相通性和互动性,因而不免给人以头痛医头之感。

为了尽可能避免把教学、研究和它们所依托的物质机构三者相割裂的片面化、平面化的做法,本书试图从“学科制度”的中观视角切入,来探究中美两国传播学如何经由建制化的过程,与既存的新闻教育接轨,成长为一门学科,并确立起其主导范式。“背后所隐含的立场,是将学科知识不单视为纯粹的知识论层面的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华勒斯坦,1999:5)。

二、学科制度(disciplinarity;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学科制度”是“学科”(discipline)一词暗含或引申出来的,即使在国外也还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相关讨论也才刚刚开始,其提出意在破除学科“自然”形成的神话,即各种学术组织和大专学院根据一些排他性的方式,与其他机构合组成各种学术社群,掌握着各种资源和权力,左右学科发展的方向(华勒斯坦,1999:5)。

“学科制度”概念大约于 21 世纪之交开始引入我国学界并引起关注。^① 最早明确提出“学科制度”概念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方文,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2001 年第 6 期上发表了《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一文,认为学科制度视角在学科知识(intellectual,一译为“理智”)视角之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杂

^① 据笔者粗浅的观察,学科制度(disciplinarity;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概念在我国的引入和兴起,可大致以 1999 年华勒斯坦等所著的《学科·知识·权力》一书的译介和 2001 年北京大学方文先生所撰的文章《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在《学科·知识·权力》中,disciplinary 一词被译为“学科规训制度”,与方文先生明确提出的“学科制度”的含义基本相通。



志编辑部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对现存的科学研究制度进行反思的可能性,遂于2002年初组织召开了“学科制度建设”研讨会,从而扩大了这一概念在学界的知晓度和影响力(方文,2001;方文、韩水法、蔡曙山、吴国盛、郑杭生、吴志攀、萧琛,2002)。

近年来,有关“学科制度”的学术讨论日渐升温,不过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大家对“学科制度”概念的理解还不尽一致,许多的讨论非但不在同一层面上,甚至大异其趣。这些讨论主要分化为以下两种思路:

第一种,以承认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走一条与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建设性思路,使这种制度更趋完善或更牢固,例如,当前的“学科建设”话语大致属于这种思路;第二种,以对既定秩序的质疑和批判为基本旨趣,以改变整个现代知识生产格局为己任,以祛除现存制度的“蒙蔽”为目标,对学科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剖析与反思(鲍嵘,2006)。

笔者认为,后一种思路更符合“学科制度”讨论的始作俑者方文的原意。诚如方文自己所指出的,尽管“学科制度”概念在学理上尚需辨明,但它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蕴含丰富的理论潜力,可用来解释学科中学派之间的竞争、更替或演变,新学科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学科发展的内因论——外因论的论争等等,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复兴的语境下有其现实意义,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全面自觉的反省和批判意识的兴起。

学科制度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形塑历来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依据方文的定义,学科制度,实质上是以知识行动者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制度体系。一门新学科合法性的建立,从学科制度而言,包括四种基本成分:一定数量有固定收入的职业研究人员以及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学科本身独特的权威出版物如杂志、期刊及书籍;正规的培养计划如规范的博士、硕士及本科教育体系,他们为该学科提供可靠的后备力量;稳定的基金资助体系。这些要素当中,一定数量的职业研究人员最为重要,他们是学科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中心。以之为中心,学生、出版物和基金,